

● 作者/James Fallows ● 譯者/王建基 ● 審者/劉宗翰

中共的大衰敗

China's Great Leap Backward

取材/2016年12月美國大西洋月刊(*The Atlantic*, December/2016)

中共政治氣候愈漸肅殺，其正歷經自天安門事件以來，最持久的國內政治鎮壓，此外在網路通訊、媒體、治外法權及軍事等層面，也凸顯中共正在倒退。即便如此，新任的美國政府還是要與中共審慎交往，因為合則兩利。

北京當局生存的根本，就是維持穩定，以及就業、薪資與生活品質的長期提升。(Source: AP/達志)



萬一中共變壞了怎麼辦？自2015年初，筆者就一直向中共的內外人士提出這個問題。筆者並不是說中共在道德上變「壞」。在外交政策中，道德與倫理因素固然重要，但筆者所要談的不是這個。

這個問題的主要重點也與經濟無關，雖然對中共而言，短期的穩定，以及就業、薪資與生活

品質的長期提升，乃是北京當局生存的根本。在中共一黨專政下，持續的經濟挫敗，自然地會引起對整個制度的質疑，正如當年的蘇聯一般。的確，當代中共的經濟表現，即便在景氣緩慢下滑之際，也可比擬蘇聯蓬勃發展之時。但是，政治不滿情緒無處可出的狀況也如出一轍。

反倒是問題的癥結點，係在中共演化的過程中，基本的東西是否有所改變，以及美國是否需要重新思考對「中」政策。1970年代初期尼克森與毛澤東的歷史性會談迄今雖已歷40餘年，但該政策卻竟然沒太多改變。經過歷屆政府代代相傳，對「中」政策向來皆是以下列相同的要件所建構：持續擴大對中

1970年代初期，尼克森與毛澤東的歷史性會談。(Source: AP/達志)



共交往；兩者經濟利益或政治價值相衝突時直率提出異議；以及冷戰式的敵對狀態，要比雙方所維持多年的和不來、不完美的夥伴關係危險得多。

在經過1989年慘無人道的天安門事變後，該政策仍掙扎延續下來。在中共2001年進入世界貿易組織，並且之後對美及世界各國貿易順差大幅成長後，該政策也繼續下去。在歷經1999年美國轟炸中共駐貝爾格勒外館(曾與筆者討論此事的中共人士都認定這是美國故意為之)、美國總統定期決定對臺軍售或會見達賴喇嘛，以及對新聞審查與人權議題迭有衝突後，該政策依然存續著。

從尼克森到歐巴馬共計八任的美國總統，都是以相同腳本與當代中共交往。但這種狀況到了第九任可能就會不一樣。2016年的中共比五年前、甚至十年前，管制更嚴格、鎮壓更為嚴厲。筆者曾經在這兩段時間住在中國大陸——2006年在上海，五年後在北京——親自見證改變。由於當代的中共混亂矛盾，任何一人隨處可見的平常事物，對另一人而言卻是大開眼



中共多年的打壓發展：對內鎮壓、對外好鬥。(Source: AP/達志)

界。真正令筆者訝異的是，一直有證據顯示，中國大陸正以不同於30多年前的方式崩解、封鎖、放任。

下一任美國總統依然會面對這一齣老戲碼，但這是個挑戰，

也是個契機。挑戰是中共多年的打壓發展：對內鎮壓、對外好鬥，看似與美「中」關係中的夥伴關係無關。機會是正可在最可能左右中共施政主軸之際，制定新關係內涵：美國新政府

開始執政。

諸位一定知道有哪些議題是新政府所注重，且對新政府的政治與實質成功至關重要。總統對大政方針發表演說；策士為文立說；各部會提出執行計畫；預算案接著通關。這是筆者期盼2017年初所能見到的種種作為。筆者在此可以報告，全中國大陸的學者與前政策官員，都已經絞盡腦汁預想總統演說將談到什麼。

與中共打交道是避無可避的。這會比從前困難，而且未來會愈來愈艱困。

為何在新總統的優先清單中，中共需要名列前茅？因為有一項重要的假定已經改變。

無論就言或行方面而言，自尼克森以後，美國歷任總統均強調支持中共持續的經濟崛起，該理論指出，一個富足中共要比窮困的中共較不令人擔心，甚至這還意味著世界經濟的中心將移往中共。在一次與《大西洋月刊》戈柏格(Jeffery Goldberg)的談話中，歐巴馬(Barack Obama)總統表示，「我已經很明白地表示，比起成功、崛起的中共，美國更怕衰弱、受威脅的中共。」

此一戰略評估的背後成因，乃是對於中共可能發展方向的假設。這並不是那種如果中共更為富足，就有可能轉為民主政體的過度簡化觀點。沒人知道這是否會發生、何時會發生——或中共是否



中共過去長期都對網際網路進行審查，並且以防火牆進行圍堵。(Source: AP/達志)

真的會持續繁榮下去。相反的，該論述所假設的是年復一年，中共與其他已開發國家之間作法的差距會拉近，因此中共會變得更容易、而非更難以應對。中共會有愈來愈多的觀光客、學生、投資人、親屬等跟世界其他地區有直接聯繫。同時也會有更多的民眾，在法國度假、在加州念書，或運用境外網際網路，而開始希望在渠等祖國也能有類似的自由空間。假以時日，中共的制度將與世界同化。

多年以來，此一假設歷久彌堅。儘管時機有好有壞，但不可否認2010年的中共，確實比2005年更加富裕與自由，而2005年又比2000年更加富裕與自由，這種現象持續不墜。

但這個假設再也不切實際了。下列各點均指向

情況有所轉變：

通訊。中共過去一直對網際網路進行審查，並且以防火牆包圍，比起以前，現在甚至是更嚴格地與世界其他地區網路分離，而且未來還會變本加厲。中國大陸的網際網路公司(搜尋引擎為百度而非谷歌[Google]，使用微信[WeChat]而非推特[Twitter])所受檢查程度更加嚴厲。虛擬私人網路(virtual private network, VPN)及其他權宜之計，十年前尚能見容於當局——發明「防火長城」檢查系統的學者，甚至誇耀他之前曾有六個虛擬私人網路與國外同步發展——但現在卻遭受北京當局攻擊。當你發現一個管用的網路時，絕對不敢在社群媒體或網站具名提起，以免政府注意到它的存在。某位筆者刻意匿名的加州虛擬私人網路公司創辦人最近告訴我，「這是一場永無止境的貓捉老鼠遊戲。我們一找出新路徑或修補程式，他們就會注意到大家在使用，然後找出防堵的辦法。最後大部分的使用者就會被搞到放棄使用。」在2015年一次為期數週的訪「中」期間，筆者透過旅館客房無線上網，交替使用三個虛擬私人網路才有辦法連上多數國際網站。2015年12月造訪中國大陸數日期間，筆者覺得實在不值得這樣麻煩，於是索性不看西方網站新聞。

中共的印刷與廣播媒體一向是由國家控制，屬於親政府派。但十年前有學者、黨工向筆者表示，「合理的」新聞評論，的確可產生重要的「安全閥」功能，可警告政府有哪些熱點問題正在醞釀。

但那些好日子到頭了。每隔一、兩個禮拜，媒體就會被習近平及其所屬警告不准唱反調、要以黨

的利益為優先，而且愈來愈露骨直白。2016年，北京當局禁止外資媒體——也就是所有不受直接控制的媒體——未經許可，不能在中國大陸發表隻字片語，同時查禁多家過去擅於規避政府管制的出版事業(著名的有《財新》商業雜誌，以及在廣州發行的《南方周末》報紙)。

2016年2月，《衛報》(*The Guardian*)刊登一則尖銳的報導指出，中國大陸的年輕記者認為，試圖報導社會上的各項挑戰毫無意義。某家中國大陸著名新聞組織的一位三十多歲編輯告訴《衛報》記者菲利浦(Tom Phillips)，「身為一名記者，再也不具任何意義了。我感觸最深的是，最近幾年新聞業的自由程度已降到史上最低點。」幾個禮拜前，筆者到上海與一群二十多歲、仍充滿理想的改革派學生見面，各言爾志。有名學生想開家法律服務事務所，為移民工人伸張權利；另一名學生則是想成立爆料新聞社，揭發都市叢林內的不公不義；還有一名則是要獻身於女權運動。要是早個幾年，筆者可能會為他們的規劃感到興奮，但現在卻感到害怕——並盼望他們最後是在其他國家實現自己的理想。

打壓民間社會。在整個共產主義時代，中國大陸除了共產黨本身外，對任何形式的組織均施以鐵腕，不使其成長茁壯。以宗教信仰為例，官方認可的宗教有五種(佛教、道教、回教、天主教與基督教)——但只能在北京當局核准之寺廟、清真寺與教堂方能進行活動。對公會(全都由共產黨包辦)、非政府組織，以及人民透過其他各種方式所組成之團體，也是比照辦理。

過去五年，中共對上述及其他所有團體的箝

制甚深。各地的教堂一個個被推平，據說這是都市更新的一環。諸多公設辯護人與公益律師身陷囹圄，女權運動重要人士和環保組織負責人也是落得如此下場。2016年4月21日出版的《紐約書評》(*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*)封面專文，是「亞洲協會」(Asia Society)夏偉(Orville Schell)所寫的〈中共的新恐怖統治〉(*New Terror in*

China)，內容是關於1960年代以後的中國大陸。夏偉告訴筆者，「有生以來，我從未想過中共會有退回毛澤東基本教義的一天。但我現在害怕會這樣。」

治外法權。最近打壓行動更形變本加厲，因為中共官員試圖將其延伸至海外。各國大多運用經濟實力提倡其政治理念或意識型態。就中共而言，最鮮明的事例，就是因為挪威的諾

貝爾委員會，六年前悍然決定將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在獄中的劉曉波，中共遂對挪威施以持續性的經濟懲罰(主要為禁止挪威鮭魚進口)。但最近中共當局開始對流亡海外的反動與異議人士親屬下手，將之囚禁或施以騷擾，並且向外國公司與組織施壓，還在境外採用中共的檢查標準。2014年，美國領英(LinkedIn)企業被發現從其全球



中國大陸除了共產黨本身外，對任何形式的組織均施以鐵腕鎮壓，不使其成長茁壯。圖為遭警方逮捕的法輪功信徒。(Source: AP/達志)

網絡對有關中國大陸的重要貼文進行檢查，就算貼文專為大陸境外人士所撰寫也不例外。這是領英能在中國大陸營運的交換條件。中共仍禁止使用推特，但在2016年4月，推特雇用一名曾在共軍及國安單位服務的工程師，擔任大陸地區常務董事。在其前幾次的推文中，有一篇是給緝密監控下的國營中央電視臺，文中說道，「讓我們一起合作，告訴世界中國大陸偉大的故事！」

改革失敗。習近平自2012年11月掌權以來，最重大的施政項目就是打貪反腐，揭開清除中共版裙帶資本主義的序幕。過去數十年的繁榮歲月，中共展現出「貪腐猖獗」(efficient corruption)的特色，而這也發生在南韓與日本二戰後的高度成長歲月。某些關係良好人士搖身一變成為鉅富——當年日本執政的自民黨黨魁，被調查員在家中查獲價值5,000萬美元黃金及其他資產後，身陷困境——但其他所有人都能妥善打理，堵住悠悠之口。在中共經濟趨緩，而有關精英階層財富的消息四散之際，海內外對貪腐的觀感，已從「必要之惡」轉為「生存威脅」。

最新一回合的媒體控制啟動，是《紐約時報》(*The New York Times*)記者張大衛(David Barboza)在2012年揭露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親屬，密藏數十億美元資產。當年溫家寶享有仁慈的大陸社會良心美名，但如今卻連其家屬都涉入，足見全國上下人人皆貪、無處不腐。眾多高官銀鐐入獄、丟官去職，或者被公開指責貪汙，包括久任一職的國安首長，以及共軍許多高官。數以萬計的低階公務員遭受處分，全國數百萬人擔心受怕。筆者個人經驗與所聽到的經常不謀而合：大

陸人民已經受夠了不公與貪腐，歡迎習近平的打貪政策。但目前仍看不出習近平打貪究竟是玩真的，或只是肅清政敵的手段。

筆者最近造訪的幾處大陸城市，日常街頭生活看起來逐漸比以前更自由、更具商業氣息。但國家政治卻比過去幾年更嚴峻，政治氣候也日漸晦暗。任教美國福坦莫大學(Fordham University)法學院的中國法學專家名克勝(Carl Minzner)於2016年寫道，「中共當前正面臨天安門鎮壓以來最長久的政治鎮壓。」而且和筆者談過的人都同意該項觀點。

排外。2016年4月，中共官方推出一套政教影片，這要是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最高峰期間的某些軍聞部，可能會被視為最差勁的宣傳手法。這部名為〈危險的愛〉短片，旨在警告大陸年輕女性，切勿被外國學生或教授的花言巧語所欺騙。萬一那位帥氣學生要真的是間諜怎麼辦？！同月，《華爾街日報》(*The Wall Street Journal*)記者陳德平報導，中國大陸公立學校引進一種叫做「找找誰是間諜」的遊戲，教育小孩要對身邊的壞人提高警覺。

一位與中共各大學以及省級、地方政府有20年生意經驗的非「中」資軟體公司負責人告訴筆者，2015年起，客戶開始通知他，奉命要改向「中」資廠商採購(若撰寫有關美國的論述，筆者決不會採匿名方式處理消息來源。然而，由於日趨嚴厲的打壓現象，所以在撰寫有關中共的論述時，不得不這麼做)。2016年春天，中共封鎖蘋果公司在中國大陸的iTunes網路電影商店、iBook電子書商店及相關應用程式。不久之後，蘋果公司全球營

收出現13年來的首次下跌，部分原因正是在中國大陸地區的收入驟降，而市場資本額也減少400億美元。中共當局打擊蘋果公司有可能出自政治動機，而非純然商業考量。正如《綜藝雜誌》(Variety)的一項分析指出，iPhone的串流視訊(streaming video)和其他裝置日趨普及，使得蘋果公司網站已成為取得外界電影、文件及其他資料的重要窗口。如此作法雖能打擊蘋果公司，但同樣也對同業的中共競爭者(最知名的是小米智慧型手機公司)造成傷害，一如在政治動機下打壓谷歌時，同樣也對「中」方的百度造成傷害。

這個影響已擴及至科技以外的層面。北京美國商會每年均對非「中」資企業在大陸地區的營運景氣進行調查。最新的調查報告指出，幾乎有一半企業的營收呈現持平或下滑，而且商業環境日趨嚴峻。四分之三的企業表示，「在中國大陸的外資企業不再像以往受到歡迎。」

軍事。這是中共最公然改變態度的面向。中國大陸領土與



2016年春，中共封鎖蘋果公司在中國大陸的iTunes等相關應用程式，造成該公司在此一地區的收入驟降，連帶影響其全球營收。(Source: AP/達志)

十餘國接壤，接鄰東、南海的至少有六個國家。當前中共與上述國家的領海問題都是主權爭端，原因在於中共進行「填海造島」計畫，以及持續在相關海域擴張軍力、漁權及採礦權。海牙國際仲裁庭就中共新一波擴大南海主權聲索所造成之爭議，在2016年7月做出有利於菲律賓、不利於中共之裁決。自此，兩造似乎又回到以前公海船艦對峙的老路，潛在分歧依舊存在。夏偉向筆者表示，「他們與許多過去的友好鄰國疏離，或

進行威嚇，因而在區域中增加不必要的緊張局勢。只有普丁(Vladimir Putin)與杜特蒂(Rodrigo Duterte)例外，」而新任菲律賓總統杜特蒂是十分好戰的。

景像。轉變中的中共對美國意味著什麼？

都是因為習近平？吾人將中共政策改變歸因於從謹慎低調行事的胡錦濤，轉為有所作為、獨斷專行的習近平看似理所當然，但是促成中共政策改變的原因，卻是早在習近平上臺之

前就開始了。

歐巴馬第一任時期的國家安全會議中共專家貝德(Jeffrey Bader)於2016年寫道，將中共近期的種種作為視作「主要是積極領導人所造成，」這是個錯誤的觀點。「積極建軍、在東海與南海的強勢作為……政治迫害及否認基本權利，」在貝德看來，凡此種種都會促使習近平提早掌權、延後交棒。上述改變並非純然是領導人風格不同所導致，而主要是領導人接收到從2008年世界金融海嘯所傳來的訊息——使人大膽亦同時令人不安。

這項訊息就是中共的時機也許終於到了。2008年金融海嘯因美國而起，當時美國陷入災難性的中東戰事已有五年，但舉辦北京奧運的中共，在各方面卻看起來光彩耀人、所向披靡。當時筆者住在北京，正好領教國營媒體及政府官員，對於帝國興衰速度比過去人們所預見更快的那種論調。一位不願具名的外國學者對筆者表示，「那次危機使得領導人在國外更有信心、更加強勢，但也對國內經濟可能遭遇的問題更加擔

心、緊張。就世界其他所有國家看來，在國外的傲慢行徑，以及在國內的偏執舉措可說是最糟糕組合。」

不安全感與好鬥的矛盾組合並非中共才有。美國自家政治中類似的事也沒少過。但中共的這種國家戰略層級矛盾，卻與許多人口中的領導人習近平相契合：他對中共在世界的外交、經濟地位愈感到不安，以及聽到他所進行的鎮壓而引發牢騷愈多，他的行為就會更加「決斷」。某位在大陸工作多年的外國商人告訴筆者，「習近平是一個想展現出強人形象的弱者。他有個鼎鼎有名的父親(其父習仲勛與毛澤東一起打游擊，並成為共黨重要領導人)，也想證明自己是虎父無犬子。正如我們在其他文化中所見到的一樣，這會是個危險的組合。」十年前筆者造訪一家以國防為主軸的智庫，當筆者看到牆上所懸掛沿著中國大陸邊界(「中」俄段除外)，標示著美軍駐地及所部署武器的巨幅地圖時，著實嚇了一跳。之後筆者領悟出在圖上明顯標示出美軍地點，乃是反映出中共一種普遍的疑

慮，那就是美國希望中共積弱不振、使中共崛起形成威脅，而且不希望看到中共成功。然而，最近筆者接觸過的人士，沒一個認為「中」美及其友盟之間會有爆發戰爭的危險——包括各界經常討論的南海意外海空交戰。事實上，在過去幾年中，美軍官員已在海軍領導下，透過各項會晤、會議、演習等時機，與共軍展開交往，其立意就是降低因誤判而爆發戰爭的風險。某位美海軍資深官員告訴筆者，「海軍部隊實際上很懂得如何降低緊張情勢，並且駛離對方航線。」

對於中共在國際上日趨強勢的疑慮，不同於當年冷戰期間最緊張年代中對蘇聯的疑慮，而是對當今俄羅斯的放大版。那就是：對美國所欲推動的諸多經濟及戰略計畫而言，中共是個障礙而非資產；是個盜賊統治及個人獨裁典型；是個有時似乎將國家利益界定在就是要給美國添麻煩的國家；是個真正的敵人，而不是難搞的夥伴。當前中共固然在各方面進行挑戰、日趨強橫，但事情還可能會變得更糟。而且這一切與

中共對人民的影響是分開的，中共將人民在學術、商業、文化方面的成就，建立在與世界隔離。

該如何應處？川普總統將面臨一種通常稱為「修昔底德陷阱」(Thucydides Trap)的困境。

「修昔底德陷阱」的說法，在哈佛大學政治學學者艾利森(Graham Allison)提出後廣為人知。此一說法在2,500年前修昔底德記述伯羅奔尼撒之戰後流傳至今，其內涵是崛起國家(如當年雅典，或當今中共)，以及既存大國(如當年斯巴達，或當今美國)，通常最後都會決一死戰，主要因為各方一定會成為對方最深的恐懼。2016年，艾利森在大西洋網站的專文中寫道，「當崛起國威脅取代當權國時，標準的危機除非能被遏制，不然通常會像1914年刺殺奧匈帝國斐迪南大公一樣，激發出一連串反應，而每個反應結果都不是各方所想選的。」

頭腦清楚的美國領袖，絕不會選擇與中共對抗。下任總統的理性選擇，就只有與其維持最佳關係。雙方在氣候與能源方面的合作，是世界其他各國

對進展仍懷抱一絲希望的主要原因。美「中」的合作與妥協，是2015年能在巴黎對溫室效應氣體達成協議的主因；對於《吉佳利協定》(*Kigali agreement*)能在2016年10月簽訂，禁用為害甚大的氫氟碳化物冷媒而言，也是同樣重要。若無中共(及俄羅斯)的支持，管制伊朗核子計畫的協議便無法達成。

中共與美國的經濟關係也日趨盤根錯節；美國大學依賴付全額學費的大陸學生；各國文化因相互交流而更加充實。各方數百萬的人民，包括筆者及內人在內，都欣賞、尊重、熱愛在另一國度中所遇見的人們。由於空氣不佳及食安問題，我們旅居大陸期間經常生病，但是在那兒每天生活精采多姿，感到更有活力與朝氣。

如果無法應對中共，美國將更無法全面發揮國家潛能。但雙方交往條件需要做一些調整。

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中國政策中心主任謝淑麗(Susan Shirk)最近告訴筆者，「我本人，以及許多終身致力於瞭解中共的人士，對所見之中共內部與國

際行為的重大改變感到憂心，對美國應如何回應也沒把握。」謝淑麗與夏偉共同成立跨黨派的美國對「中」政策小組(Task Force on U.S. Policy Toward China)，由將近24位學者，還有甫自民主黨及共和黨政府退休之官員所組成。該小組計畫向新任總統提出報告，檢視因應中共萬一真的變壞時之選項。

該小組的工作正在成形，其成員如同其他曾處理當代中國大陸種種矛盾的人士，自然會對諸多細節與重點提出異議。但在與諸多過去曾經研究中共事務之人士交換意見後，筆者有若干共同觀點似乎可成為下一個中共政策的要素。這些觀點包括：

小心選擇戰役。中國大陸周邊海域，已成為近期最大規模展現實力的所在。但是就地理、歷史及國家心理觀之，這些地方可能不適合用於大張旗鼓地劃清界線。

白邦瑞(Michael Pillsbury)是長期研究共軍且獲圈內人咸認為鷹派的人士，其曾提出一項理由。在2012年某期刊一篇名為〈十六種恐懼：中共的戰略

心理》(The Sixteen Fears: China's Strategic Psychology)專文中，白邦瑞認為，美國要展示在區域之決心與兵力時，最自然採取的手段，就是最可能引發中共敵對反應的手段。例如，文中所列的前三名為「懼怕島嶼封鎖」、「懼怕喪失海洋資源」、「懼怕海上交通線被截斷。」(對美國而言，首先則是「懼怕突襲」，類似珍珠港事件或911事件之類的突襲，其次是「懼怕國家衰退」，原因可回溯至開國初期)。因此，美國打算用來恢復前習近平規範的作法，可能會觸發修昔底德陷阱，並且成為一場國家威望、政治價值及國際整體地位的對決。

謝淑麗告訴筆者，「我真的認為我們現在就像處理古巴飛彈危機一樣，正冒著過度處理南海問題的風險。然這不是古巴飛彈危機。美國的利益有限，而且我們也不需只為了維持『信譽』而多做些什麼。」

爭一時，也要爭千秋。對大多局外人而言，習近平時代的戰略選擇似乎操之過急、不自量力、終致自我挫敗(顯然並非只有中共遭遇算計失策的結果)。中共目前對內部鎮壓模式及對外部的處心積慮，可能會對自己造成重大傷害，而使自己領導人最後選擇不同的作法。

在大陸內部，妨礙中共達成高端科技、高級文化目標的主要障礙，就是習近平主政時日趨增加的鎮壓行動。只要僅能上本土網路的規定不變，中國大陸的大學將永遠是二流學府。只要政府明顯干預金融市場，中共的投資環境就會受限。佛里曼(Chas Freeman)告訴筆者，「中共的政治模式是決不可上訴，自家人也不行。這種自成一格是

別人學不來的。」佛里曼是老布希總統時期美國駐沙烏地阿拉伯大使，但在20年之前身為國務院年輕官員時，即擔任尼克森(Richard Nixon)在北京首次會議的傳譯。

和筆者談過的人幾乎都同意，中共操之過急所造成的負面效應，會遠大過其海外援助與孔子學院所培養的善意，而孔子學院旨在全球各地教授華語並推廣中華文化。

此一評估意味著美國應置重點於度過即將來臨的艱苦歲月，這段艱苦歲月將可能長達數年或數十年，勿因歷史目前看似站在中共壓迫的治理模式這邊而感到驚慌。2016年春天，一位美國盟邦的國家情報總監告訴筆者，「中共的戰略確實是自我挫敗。但我怕它不夠真實、發生地不夠快，沒法讓相關人士感受到這痛苦的事實而做出改變。」對他的國家及對美國而言，他說，好比在中共的回饋迴路中，處理此一延遲問題是項挑戰。

持續形塑中共的選擇。就在筆者的對話即將結束的時候，筆者會問每個人，「美國轉變中共行為的最佳工具為何？」每個人會停頓一下、看看窗外喝口咖啡，然後開頭先說，「嗯，這很複雜，因為……」而這個問題就複雜在美「中」之間在經濟上的關係已變得錯綜複雜，並且在科學、環境、學術，甚至外交領域等各方面，都有著建設性的合作關係，因此幾乎所有可用於「懲罰」中共的作為，也一定會對美國及世界其他國家造成損害。舉個最簡單的例子：當川普在2016年10月被問到美國如何因應中共的各項過分行為時，他說如果「美國切斷與中共的(經濟)關係，中共就會迅速破產。」美國及其他國家當然也會迅速破產，因

為中共已經融入美國製造供應鏈，而且還對美國房地產及金融市場進行大量投資。懲罰中共會引火上身的因素，並非中共「控制了」美國，這正是許多美國人所害怕的。問題出在這兩個經濟體，已經同為一個大經濟體的一部分。

同樣的，對中共的教訓與指責，從未有紀錄顯示能夠改變其行為；如果有的話，那就是使其變本加厲。

然而，有種戰略可能管用，某位前西方國家駐「中」大使是這麼說的，「形塑一個現實情況的作法，旨在不吸引中共去遵循當前路徑。」近期最顯著的事例，就是共軍以網路駭客手法竊取美國商業機密。2015年習近平訪問華府時（就在教宗方濟各[Pope Francis]之後，而方濟各吸引較多的媒體與人群），各方咸認歐巴馬總統一定有向習表示，美國對此已無法忍受。政府對政府的間諜刺探與駭客入侵？當然，這種事稀鬆平常。但是政府竊取外國企業秘密來幫助本土企業生存，那可就是另一回事了。而且如果中共不收手，美國政府就可能找出辦法讓大陸企業更不好過。透過運用美國自己巨大的網路干涉能力？透過阻撓投資？透過改變對中共有影響力家族與官員的簽證政策？歐巴馬留給習近平自己想像。歐巴馬的談話並無針對性、亦非直接威脅、也不對外公開，但顯然很管用。在多數案件中，共軍對美國企業的駭客入侵行動已有減少。

美國無法在所有領域都能享有網路公司所給予的電戰優勢。但仍以其發達的經濟、無與倫比的強大軍力，以及極優越的同盟網絡，在兩者關係中仍扮演強者角色。而且美國也能運用這些優

勢形成現實環境，讓中共在其中選擇未來方向。

以下的講稿，可事先作為美國總統在新上任初期，對於美「中」交往的新前提：

45年來，歷任總統均致力於建立一種能夠協助中共發展經濟、恢復其國際尊榮地位的夥伴關係。美國深信，為中國大陸人民創造更美好的未來是正確的。美國國民的生活，也因為此一關係而更加豐富。這是一種中國大陸人民、美國人民，乃至全世界人民都引以為傲的成就。

但是此一關係是建立在平衡與互利的基礎之上。美國會敞開胸懷接納中國大陸人民及其理念，而中共對美國也應如此。美國願將中國大陸企業融入美國經濟，而美國企業也能在中國大陸有公平競爭的機會。近年所發生的種種事件，使美國不得不再度思索，中共領導人是否認為兩者關係仍是平衡、互利的。美國也希望中共再想想最近的行為，並回到合作的道路上。中共領導人講話時常引經據典，在此本人也引用美國的諺語，「老子手上可是握著橄欖枝跟大棒的。」美國想要的是遞上合作的善意橄欖枝，長久以來雙方為此而獲益甚多；但美國同時帶上了棒子以備不時之需。

作者簡介

James Fallow係《大西洋月刊》的通訊記者，其自1970年代末期即為該月刊撰文，曾擔任前美國總統卡特任內的首席文膽。

Copyright © 2016, *The Atlantic*. Distributed by McClatchy-Tribune Information Services.